

2014 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欧阳向英*

本文选取 2014 年度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和《新左派评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以及本年度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从不平等问题、反思资本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四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梳理。《21 世纪资本论》引发国际不平等问题成为学术热点,两条道路之争仍是传统重要议题。

一、前言

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崛起与美国的霸权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一度平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争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反思可能预示着世界思潮的变革与转折。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看待不平等问题,社会主义是否最终解决方案,东西方学者积极探讨并给予了回答。2014 年度,全球左翼学者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热点问题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颇富新意的见解。虽然某些观点可能尚存争议,需要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逐步成型,解释力得到加强。

本文选取 2014 年度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和《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上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共 35 篇,以及本年度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共 14 部。选取的标准是:首选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问题的交集,其次偏重经济学,最后适当选取与经济议题有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问题的交汇点,但并不在本综述选取范围内,因为本学科更侧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上述期刊发表了一些多视角研究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论文,由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有借鉴意义本文亦不收录。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的西方作者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方法、分析的框架和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或有思想渊源,或形成对比参照,总体可称国外左翼。为了将更多有活力的思想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视野,我们尽可能将国外左翼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文章收录在内。受选取范围等客观限制,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 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oyxymail@126.com。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自负文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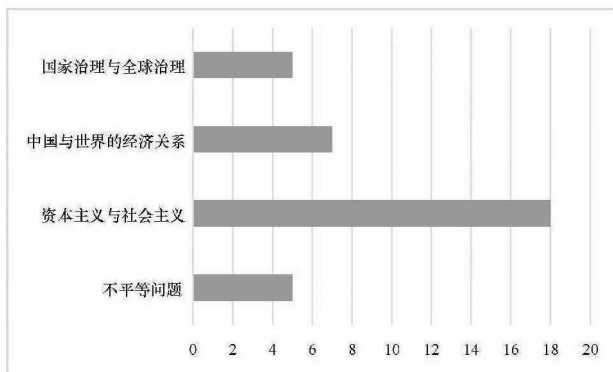
2014年,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主题集中在以下四类:不平等问题、反思资本主义与构建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国外理论动态》对此类议题涉及最广,本年度发表相关论文14篇。《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体相当,分别发表9篇和8篇。《中国社会科学》的议题分布较均衡,就4类议题中的3类每类发表1篇(见表1)。《新左派评论》《每月评论》和《社会主义年鉴》是国外著名的左翼学术期刊,研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不考察它们的发表情况。遗憾的是,来源于这三种期刊且纳入到本文的文献很少,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发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而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中国或拉美国家,前者对我们来说不属于国际问题的研究范围,后者的探讨往往在现实层面而缺乏理论意义,故舍去。

表1 2014年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分布*

类别	中国社会科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国外理论动态	新左派评论	每月评论	社会主义年鉴	合计
不平等问题	0	2	1	2	0	0	0	5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1	2	6	9	0	0	0	18
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1	4	0	1	1	0	0	7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1	0	2	2	0	0	0	5
合计	3	8	9	14	1	0	0	35

*表中只收录期刊来源的文献,不包括图书。

从话题重要性来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仍是传统重要议题,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也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看上去不平等问题与全球治理问题文献数目相同,但实际上《21世纪资本论》引发了东西方学术界普遍关注,大量书评和研讨会综述不在我们的文献收录范围内,所以国际不平等问题毫无疑问是2014年国际学术热点(见图1)。



从主要期刊发表情况看,《国外理论动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值得本学科持续关注,而国外期刊将逐步调整(见图2)。下面将对文献内容分类加以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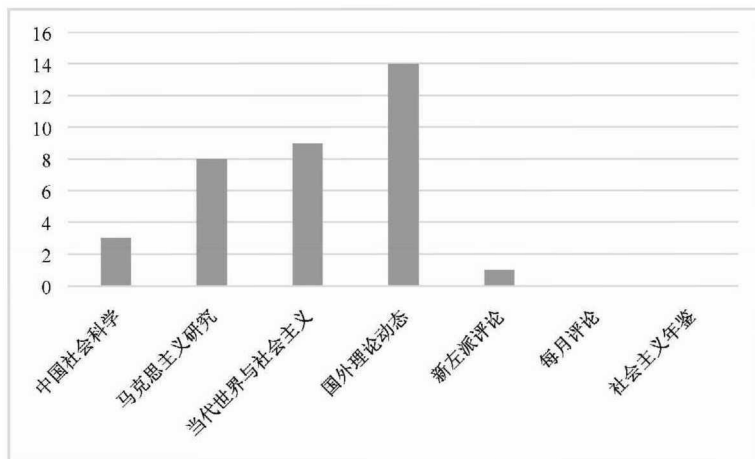


图2 2014年主要期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发表情况

从图书出版情况看,大学出版社和专业的学术出版社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图书的主要平台。2014年,美国出版该类图书4种,英国出版6种,中国、加拿大、日本和荷兰各1种,表明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英美两国得以延续。

表2 2014年度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图书出版情况*

序号	出版社	所在国	数量
1	Belknap Press (隶属于哈佛大学出版社)	美国	1
2	中信出版社	中国	1
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国	2
4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加拿大	1
5	Routledge	英国	2
6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美国	1
7	Springer Tokyo	日本	1
8	Monthly Review Press	美国	2
9	Brill Academic Press	荷兰	1
10	Palgrave Macmillan	英国	1
1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国	1

*表中只反映本文收录的图书出版情况。由于资料来源有限,统计并不完全。

二、国际不平等问题

国际不平等交换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但却一直被基于现实主义研究的世界经济学界有意无意忽视。该领域的中文著作《国际不平等交换多变量影响模型及衍生效应》于2011年出版，通过构建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多因素影响模型，对其决定因素及衍生效应进行分析，并利用国际和中国的相关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对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性、诱因性、衍生性等问题进行实证检验，最终从体系上构建起一个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框架，以期为促进我国贸易利益增长、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不平等交换地位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应该说，这是一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不平等问题的重要作品，遗憾的是，该书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直到舶来品《21世纪资本论》传入，国际不平等问题才引发学术界普遍关注。

对国际不平等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六种。

一是资本视角。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21世纪资本论》^①审视资本主义和不平等重要话题，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并引起许多重量级人物的热议。中文版于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关注19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的变化趋势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认为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从长时段来看，21世纪的资本构成与19世纪大相迥异，但资本收益率却旗鼓相当，大致在4—5%左右。皮凯蒂的结论是： $r > g$ ，即资本收益率（ r ）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 g ）。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二，皮凯蒂运用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佐证“库兹涅茨曲线”，证明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里。从19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贫富分化呈U型曲线，70年代后有所加剧。如果继续现在的趋势，21世纪将会和19世纪一样：巨大的贫富落差、尖锐的社会矛盾、红旗到处飘扬，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战争。第三，为了改变21世纪贫富恶化的趋势，皮凯蒂主张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征收累进税。皮凯蒂并不主张建设人人平等的空想世界，也不是要回到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甚至不认为政府的规模会出现较大的扩张，但是皮凯蒂认为，政府亟须强化其社会职能，为了维护民主政治的稳定，必须遏制财富过度地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这是避免出现社会动荡的最佳方案。无论对贫富分化的分析，还是对不平等的解决方案，皮凯蒂理论引起的反对与赞成几乎同样多。我们将在“总结”部分再做探讨。此后，丹尼尔·柯亨主编《不平等加剧的经济学》收录了包括皮凯蒂在内诸多经济学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论文，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程度进行力学分析，包括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如技术或统计参数的变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或有后果，对该问题做出了理论和实证的贡献。^②

二是全球劳动力结构的视角。劳尔·德尔戈多·怀斯对全球范围劳动力被迫转移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了新全球结构对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水平的冲击及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统治政策、国家和地区内部加剧的不平等、严重的劳动力不稳定和剥削

^①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② Cohen, D., Piketty, T. & Saint-Paul, G. (2014). *The Economics of Rising Inequalit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现象、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等方面的分析，怀斯得出劳动力被迫转移已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的结论，并提出了通过社会组织和运动的统一以遏制对工人阶级不利因素的思路。^① 劳动力视角与资本视角两相呼应，构成马克思主义对国际不平等问题的分析框架。

三是全球价值链视角。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多以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但回避甚至故意掩盖了由此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马克思对这一研究传统进行了批判，深刻揭示了国际分工的剥削本质，并以“资本家的手”取代了“看不见的手”。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在“资本家的手”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经由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转变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的经济霸权体系。此霸权体系的关键在于流通环节，其作为价值的实现过程决定了财富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② 从国际分工到不平等交换，全球价值链视角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秩序和贫富差异最为有力的分析工具之一。

四是经济民主视角。加拿大学者汤姆·马勒森认为，当前人们越来越视经济民主为左翼的“大概念”。虽然其基本的内核——经济的各部分应该受民主监督——并不新颖，但是经济民主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范式、作为相对密切且内在一贯的批判和改革行为体的出现，确是新发展。从工厂民主到投资民主，再到市场体制民主化，作为整体的经济民主为挑战不平等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通过代表，尤其是通过直接参与经济决策机会的增多而带来的民主问责制的发展，对纠正结构不平等特别重要。^③ 国际全球化与发展中心总裁安德烈斯·索里马诺的著作《经济精英、危机和民主分析》也献给同一主题，即关注社会各基层的分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该书描述了企业家和企业技术阶层的崛起，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分裂，以及工人如何被边缘化。通过回顾从9世纪到现在历史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事件，在分析各种相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性、全球社会运动和移民问题基础上，作者提出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民主进行改造。^④

五是政治正义视角。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以往工人阶级斗争的焦点在于收入分配，应重新审视正义的“分配范式”，因为仅关注分配正义可能导致忽视社会政治权力即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艾利斯·马瑞恩·扬对政治正义的阐述不可能无视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等进步思想，也要对诺齐克非历史的正义模式进行回应，同时利用自我所有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社会联系模式”的概念，将正义思考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层面，提出一种结构性正义的责任理论。^⑤ 班廷的研究也表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压力，包括技术变革、新的家庭形式和市场收入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的不平等表明再分配政治的衰落，而再

① 劳尔·德尔戈多·怀斯、王乙茹（2014）：“移民与劳工问题：帝国主义、不平等发展和劳动力被迫转移”，《国外理论动态》，第4期。

② 丁涛（2014）：“全球价值链的霸权性质——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

③ 汤姆·马勒森、彭萍萍（2014）：“经济民主：21世纪左翼的‘大概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3期。

④ Solimano, A. (2014). *Economic Elites, Crises, and Democracy: Alternatives Beyond Neoliberal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 瑞尼尔·福斯特、周穗明（2014）：“激进的正义：论艾利斯·马瑞恩·扬对‘分配范式’的批判”，《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

分配的衰落是由全球经济压力、意识形态和政党制度的变化等导致的。^①

六是对贫困概念的解读视角。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今世界，如何理解贫困成为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问题。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来认识贫困将会产生诸多问题，渡边雅男、谭晓军通过揭示传统意义上对于贫困概念的误解以及用社会科学的视角重新定义贫困概念，对现代意义上的贫困概念进行阐述。这不是一般的哲学视角，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作者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以此解读贫困产生的原因。^②

从资本到劳动力结构再到全球价值链，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正义再到哲学反思，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不平等问题给出了分析和解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国家，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应有之义。

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普遍的经济萧条。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一些国家经济严重衰退，甚至濒于破产，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的综合实力下降，影响到其制度信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分析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研究视阈，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热点问题。针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一些学者提出新社会主义的概念与制度设计。

（一）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反思从单一国家拓展到全球，并预警新一轮资本市场泡沫或已形成

首先，经济危机频频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密切相关。刘元琪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最深刻的变化是经济的金融化。考察金融化的形成过程和基本表现，可以发现金融化的本质内涵是：金融部门借助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将全球一切经济因素引入金融市场，从而在全球建立了一个依附关系的密网，并最后实际上控制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领域的利润的生产和汲取，其外在表现是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③李国平、周宏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活动的全球化；二是金融机构全球化，出现全球性“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三是国际金融资本具有明显的“游资”特征；四是“历史的终结”思潮的盛行，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态。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财富创造方式的趋同化；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是一种社会、政治与法律现象，即社会经济制度的趋同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提高全

^① Banting, K. & Myles, J. (2014). *Inequality and the Fading of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② 渡边雅男、谭晓军(2014):“世界的贫困 贫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第7期。

^③ 刘元琪(2014):“金融资本的新发展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球生活水平方面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尤其二战以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二是它不仅影响到现代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稳定，而且影响到主权国家的金融主权，进而影响主权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安全。因此，在充分利用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同时，如何有效维护国内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①

其次，资本相对过剩和弹性劳动制是金融危机的成因。弗雷德里克·博卡拉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与资本过剩积累相关。固定资本的上升和可变资本的下降导致有机构成的增长，从而促使利润率下降、失业率攀升、有效需求不足。当代资本主义的信息革命、货币革命、生态革命和人口革命极大地激化了系统矛盾及系统性危机，而目前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即对金融赢利进行简单限制，并不能真正解决危机问题，应当采取替代方案促进资源的全球共享，将投资在金融领域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发展就业和公共服务领域。^②拜斯德伯·达斯古普塔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是三个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过程，共同推动了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全球金融利益主导着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从弹性劳动机制的角度分析，经济变化带来的风险最终将由劳动者承担。政府一方面放松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却通过弹性劳动机制加强对劳动力的管制。弹性劳动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流入金融部门，如果没有弹性劳动机制，全球金融及其运行网络就无法维持。全球金融资本主义试图借助全球化和金融化发展壮大，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过程中，必然衍生全球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求一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劳动制度，以对抗金融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③

最后，对新一轮资本市场泡沫和国际金融战争提出预警。朱安东认为，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从上一轮危机中复苏、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时，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泡沫又已初步成型。发达国家缩减财政支出尤其是福利支出是经济停滞的直接原因，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并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金融垄断资本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逐步掌控了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并在危机爆发后通过政府及时“救市”挽救了自己并更加壮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将越来越小，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将更加尖锐，停滞、危机和动荡将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金融资本主义可能将难以持续。^④程恩富、杨斌认为，当代世界已进入金融主导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发动大规模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是重要特征。金融危机已不再是无政府的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华尔街垄断财团大规模掠夺全球财富的手段。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的跨学科和系统思维方法，将分析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不同利益集团为追求经济利益进行的博弈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看透美国金融垄断财团将金融战争作为掠夺财富手段的严峻现实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⑤

① 李国平、周宏（2014）：“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质及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期。

②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赵超（2014）：“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③ 拜斯德伯·达斯古普塔、车艳秋（2014）：“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全球危机和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国外理论动态》，第11期。

④ 朱安东（2014）：“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2期。

⑤ 程恩富、杨斌（2014）：“当前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若干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此外,国外左翼学者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对当前经济危机的分析主要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经验主义的折中主义方法;另一种是在概念上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大跨度跳跃到对特定危机的分析。其实,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描述了一种关于研究次序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运用这一方法,有可能加深我们对2007年以来经济危机的理解,并克服前面两种方法的弊端。^①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著名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认为“利润挤压”是造成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利润挤压论”是虚假的,应支持工人为了更高水平的工资而进行阶级斗争。^②《全球资本主义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则从社会和历史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尤其是2007—2008年危机进行解析,从而提供了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相互转换的视角。^③如果想要更深入地挖掘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传统与研究方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④

(二)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与反思

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转型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森(Neil Davidson)、波斯特(Charlie Post)、巴纳吉(Jairus Banaji)和赫勒(Henry Heller)等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转型的新著得到极大关注,因为对转型的不同分析将引导转型国家通往历史和社会进程的不同路径上去,这就涉及用什么特性来定义资本主义。^⑤露西亚·普拉德拉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的本质和当前危机的意义进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⑥2013年,日本京都召开“超越全球资本主义”国际专题讨论会,并出版论文集,提出近几年全球资本主义或全球化力量迅速增强,给世界人民带来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该书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人类学、历史和政治科学等多种角度研究解决由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世界性问题,认为在21世纪应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促进社会稳定和弹性经济的发展。^⑦

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批判与反思。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进行批评,认为不存在任何划时代的创新或其他拉动经济的外在因素,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停滞,包括资本在世界积累的停滞。^⑧汪行福从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

① 比尔·邓恩、陈人江(2014):“马克思的方法与全球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刘顺、胡涵锦(2014):“马克思、卡莱茨基与社会主义策略”,《国外理论动态》,第3期。

③ Dumm, B. (201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apitalism and Crisis*. Routledge.

④ Howard, M. C. & King, J. E. (2014).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⑤ 保罗·海德曼、乔纳·伯奇、聂大富(2014):“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再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三种不同观点的交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

⑥ Pradella, L. (2014). *Globaliz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Insights from Marx's Writings*. Routledge.

⑦ Fujii, S. (2014). *Beyond Global Capitalism*. Springer Tokyo.

⑧ Foster, J. B. (2014).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n Elaboration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Monthly Review Press, U. S.

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和文化资本主义等多个视角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包含着明显的弱点,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① 欧尼斯特·司克瑞庞蒂认为,帝国主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全球帝国主义”阶段。此时,民族国家框架变得松散,资本在全球自由地追逐利润,跨国公司试图摧毁一切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在深入研究全球帝国主义的内部工作原理,解释为何它不同于过去形式的帝国主义,如何改变全球的工资分布,以及跨国公司的强力意志之后,他认为全球帝国主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没有一定的结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当经济危机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来越趋于专制的时候,民主和人道的世界的愿景最终落实在股权上。^② 姜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同时期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积极借鉴和辩证批判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列宁帝国主义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和运动规律进行实证分析,从批判逻辑、解释逻辑和建构逻辑层面实现了理论与思想的升华,具有独特的理论原创性。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历史走向的理论反思,是对帝国主义引起的世界结构性矛盾的实践回应,是努力探索和建构新文明社会价值诉求的时代反映,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思想深化。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原则没有过时,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在向旧世界价值观、制度和实践宣战的同时,为未来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认知方法、哲学态度和价值理想,成为跨越历史时空的人类宝贵财富。^③

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弗雷德·马格多夫认为,全球资源耗竭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的无止境追逐造成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其出路在于构建一个不依赖物质消费增长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全球生态环境。^④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世界既掠夺资源又倾倒垃圾,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展开双向度掠夺。同时,它们还企图打着“民主”、“人权”等幌子对此予以美化、掩饰和辩护。生态帝国主义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之中的全球扩张现实。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市场、技术、道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重建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出路。面对生态帝国主义,我们要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联合斗争,完善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与投资制度,理性分析国外环境理论,避免生态帝国主义向我国延伸。^⑤

资本主义走向的阶级分析。杰瑞·哈里斯认为,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种竞争性斗争是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成员实施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的金融和生产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追寻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内在结构性要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每个国家按各自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这一计划充满着紧张和竞争,但

① 汪行福(2014):“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

② Srepani, E. (2014). *Global Imperialism and the Great Crisi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U. S.

③ 姜安(2014):“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④ 弗雷德·马格多夫、张番红、刘生琰(2014):“全球资源耗竭:是人口问题吗?”,《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

⑤ 李娟(201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与当代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其共同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体系。^① 朱安东、蔡万焕认为,危机前的阶级结构是: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膨胀,劳工力量被削弱,中产阶级被挤压;危机后的阶级结构是:金融资本家未受实质打击,力量继续膨胀,中产阶级继续萎缩,民众在觉醒,劳工力量在壮大,但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基于以上阶级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大资本将进一步右转,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② 苏珊·斯普荣克等人探讨了阶级与拉丁美洲国家形式之间的关系^③,汤姆·考德则研究拉美左翼政府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斗争,尤其是委内瑞拉和巴西政治变革和解放潜力^④。

(三) 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

与生态帝国主义相对立,左翼学者提出生态社会主义。乔尔·科威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幽灵的继承者,它把资本主义视为人类的大敌,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癌变,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自然界和人类都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推翻资本主义是克服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不是一个政党,它属于左翼,但又经常在批判左翼。生态社会主义区别于环境保护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心。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革命,其目标是按照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转型。^⑤

社会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走上质量发展的必然结局。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认为,美国步入富裕社会阶段后仍存有贫困问题,尤其是因无法满足公共需求而产生的公共贫困问题,在于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计划体系和弱势的市场体系,两种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是美国贫困等现象产生的根源。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实行“新社会主义”,即由政府通过公有制对计划体系的权力进行限制,对市场体系加以扶持,以此加强对计划体系的抗衡力量,促进两种体系的平衡发展,最终达到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目标的目的。“新社会主义”是经济学的概念,其实施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但对于认识当前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⑥

“红色全球化”是奥斯卡·桑切斯—斯波尼对冷战时期塑造全球经济的斗争所做的重大重读。他认为,相对自由的世界经济,苏联代表一种平行的社会经济构造。虽然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不能左右全球经济格局,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从自给自足逐步扩张,发展出与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相同的“红色全球化”路径。远离世界的核心,苏联只有

① 杰瑞·哈里斯、孙寿涛(2014):“全球垄断与跨国资本家阶级”,《国外理论动态》,第6期。

② 朱安东、蔡万焕(2014):“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的走向——阶级分析的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③ Spronk, S. J. & Webber, J. R. (2014). *Crisis and Contradiction: Marxist Perspectives on Latin America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Brill Academic Press.

④ Chodor, T. (2014).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he Pink Tide in Latin America: Breaking Up With TINA?* Palgrave Macmillan.

⑤ 乔尔·科威尔、郎廷建(201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国外理论动态》,第10期。

⑥ 刘合波、秦颖(2014):“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6期。



设法成为世界能源供应商以及全球南南合作的重要力量。^①

四、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迫在眉睫、势不可挡，与西方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两个体系综合实力此消彼长、动态博弈，推动全球生产关系和治理模式逐步变革。面对国际经济的重重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世界摆脱危机。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与出路

中国落入“分工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王勇、范从来认为，当前流行的“货币超发说”基于古典货币理论，本质上将货币职能仅归结为流通手段，所以得出 M2 大于 GDP 就存在货币超发的片面结论。基于马克思内生货币观，即货币系统是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平均速度，中国并不存在“货币超发”。马克思从商品交换中分析货币起源，并将货币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而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货币论也必然随之变化。用第一、第二产业占中国 GDP 比重较大，从而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投入，导致低估第三产业欠发达的中国对货币的实际需求，可以解释造成 M2/GDP 数值偏高的假象，而美国恰好相反。因此，中美 M2/GDP 的差异不在货币层面，而是产业结构异质的体现。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呈现出“去工业化”与“虚拟化”的新特点，中国容易落入“分工陷阱”，形成下游产业链锁定；外汇头寸增长造成的货币被动发行路径依然存在，而加工贸易的顺差导致的增发货币留在国内，利润则流向跨国母公司所在地；中国面临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扩张和资产生产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投资—储蓄缺口下积聚了大量流动性，从而使中国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为应对可能陷入的一条始于产业、显于货币的危机链，中国应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加快人民币国际化。^②

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使中国金融风险加大。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过大，增长过快，结构不合理，收益率不断降低，因此面临着税务风险、财政危机性风险、政治风险、汇率风险以及沦为经济殖民地等多种风险。中国必须从国家竞争战略、国家经济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的角度，高度重视当前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中国必须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多渠道降低美债规模，优化美债投资结构，以期防范和缓解持有美国国债的各种风险。^③

国际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导致中国现代化面临深层困境：既必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会被国际垄断资本边缘化而陷入低水平“中等收入陷阱”。走出这一困境要求当代中国必须走新型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该道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公

^① Sanchez-Sibony, O. (2014). *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王勇、范从来 (2014): “产业结构与货币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中美 M2/GDP 差异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11 期。

^③ 鄢杰 (2014):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不合理性、风险及对策探讨”, 《马克思主义研究》, 第 10 期。

有制计划经济建构立国之本；第二个阶段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出场，以我为主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兼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包容与引导民营资本共同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两个阶段一脉相承，前者为后者建立了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发展。^①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对中国崛起的评估。西恩·斯塔斯认为，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和南方转移，这个公认的结论或许需要重新评估。当人们强调西方统治的结束和一个新的霸权处于崛起的边缘，特别是中国重返世界舞台被看作预示着“亚洲世纪”的曙光时，往往被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再平衡含义，然而这个故事是一种误导，首先是因为它极大地夸大了作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力量美国的衰落，其次所谓的“新兴市场”的兴起在2011年左右达到高峰，却不会改变其商品出口到西方国家的路径依赖（与中国的部分除外）。中国的崛起虽然强势，但与当年日本的崛起相比，中国企业并没有取得在各个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全球经济力量的任何调查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世界领先的跨国公司仍在美国。^②

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莱斯·詹金斯认为，近10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考察中拉之间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他资金流动的增长后，他指出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在于获取原材料、找寻制成品出口的市场以及在此与中国台湾进行“外交”争夺。中拉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可以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相对重要性、贸易流的构成以及FDI的差额之中看出来。这些都表明中拉关系具有“中心—边缘”关系的特征。然而，中国还远非拉美地区一支新的霸权力量，而且对拉美国家来说，与美国以及欧洲的关系的重要性仍旧大于与中国的关系。^③

（三）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应采取的策略

反“西方中心论”。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彻底摆脱“东方社会停滞”等“西方中心论”词语表述影响的同时，把其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由西欧推及世界，彻底超越了“欧洲独特”说，最终完成了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通过回顾马克思为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中的俄国农村公社和整个俄国指出一条与资本主义息息相关、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发展路径的过程，基于三重维度，叶险明对“西方中心论”进行批判，丰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底蕴，为中国走特色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④

争取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国际经济博弈的本质是人类总体实践结构中相对独立、不同层级子系统间的矛盾互动。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是行为主体在国际经济博弈中对有利

^① 鲁品越（2014）：“国际体系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两个阶段——立足唯物史观对‘中国奇迹’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

^② Starrs, S. (2014). The Chimera of Global Convergence. *New Left Review*, vol. 87.

^③ 莱斯·詹金斯、郝诗楠（2014）：“拉丁美洲与中国：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国外理论动态》，第2期。

^④ 叶险明（2014）：“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态势的争取、保持和发展。国际经济博弈涉及主体、环境、要素和结构。争取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需要形成先进生产方式或相对优势，促成有利的博弈机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国际经济博弈本质规律并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认同四个维度不断形成相对优势，为领导先进的世界性历史实践集团创造条件是中国争取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关键。^①

五、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

国家治理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西方世界遭遇治理危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必须考虑全球向度的背景下，治理问题就具有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色彩。2014年，各大期刊发表了众多有关国家治理的论文，在此我们仅收录与国际政治经济有关的，以及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论述全球治理的文章。

西方世界遭遇治理危机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的背景之一。查尔斯·A·库普坎认为，一场治理能力危机正吞噬着世界各大工业化民主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正不约而同地经历着政治衰退，这不是巧合，而是全球化所致。纵观整个西方开放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选民对政府的期待与政府实际所能满足的要求之间正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水的治理供给之间严重失调，西方世界的权力和效用岌岌可危。^② 此种情况下，国家治理考虑全球向度不仅应该，也有必要。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出治理困境的过程。从国家建构的三大维度，即政府职能、治理能力与合法性面向出发，比较分析不同阶段、不同遭遇的治理变迁问题，可以揭示出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困境、发展型国家的包容性困境和转型国家的制度性困境，有助于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问题。^④

雅库布·哈拉比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

① 陈鹏（2014）：“论国际经济博弈主动权的争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期。

② 查尔斯·A·库普坎、寿春（2014）：“治理鸿沟：全球化与西方民主的危机”，《国外理论动态》，第5期。

③ 杨雪冬（2014）：“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期。

④ 时和兴（2014）：“国家治理变迁的困境及其反思：一种比较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1

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①

气候是全球治理的大问题。西方经济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程和影响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并给出了各自的应对方案。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的结果，并提出以市场化和地球工程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方案。其非正统经济学者则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系统性结果，主流方案无法根本解决气候问题。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者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气候变化归因于资本积累的扩大，认为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化的气候治理，将增加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谢富胜等重建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范围的行动。生成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马克思式”大众运动，通过联合主张可持续发展的资本集团参与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运动，是实现大众气候治理的可能途径。^②

六、总结

如果评选 2014 年哪部作品最具轰动效应，答案无疑应该是《21 世纪资本论》。虽然皮凯蒂本人不承认自己的左翼或右翼倾向，甚至说他从未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解读者无不注意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一个月内写了四篇书评，盛赞其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 10 年最重要的一本书”，并认为该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告诉世人：我们不仅已经踏上了收入水平回归 19 世纪的道路，而且还正在向“世袭资本主义”回归。^③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经济学家曼昆、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泰勒·考恩等则对该书提出批评，归纳大致有三点：一是皮凯蒂的理论没有周全考虑到资本回报率递减的情况，即资本回报率随着投资者积累更多资本而下降，因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总是会被首先利用（萨默斯，2014）；二是皮凯蒂对不平等问题归因并非“铁律”，几乎不可能预测哪些生产要素将带来最大的回报，就像李嘉图过于倚重土地“租金”力量一样，皮凯蒂对富人拥有的资本“下注过多”（考恩，2014），不平等现象更多地与特定政策选择有关（萨默斯，2014）；三是皮凯蒂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糟糕的行动指南”，征收资本累进税可能影响企业家积极性，压制创新，很难行得通。^④ 美国著名《资本论》研究者大卫·哈维也对该书持保留态度，认为皮凯蒂没有为 21 世纪的资本提供出有效模型，虽然其数据富有价值，但对不平等和寡头化趋势出现的解释则有着严重缺陷，掩饰了阶级政治的存在，其补救建议即使不是空想的，也是幼稚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或者马克思著作的现代版“等价物”。^⑤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迈克尔·耶茨发表长文，提出皮凯蒂理论进一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出现危机，因为后者不能对长期停滞的现实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进行有效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倡导平等的资本主义，但费尔德斯坦和卢卡斯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表明，

① 雅库布·哈拉比、钟晓辉（2014）：“全球治理扩展至第三世界：利他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国外理论动态》，第 8 期。

② 谢富胜、程瀚、李安（2014）：“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11 期。

③ 保罗·克鲁格曼、王浩（2014）：“为什么说我们正身处一个新的‘镀金时代’——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的资本》”，《国外理论动态》，第 9 期。

④ 金辉（2014）：“《21 世纪资本论》观点引发论争”，《经济参考报》，2014 年 6 月 11 日。

⑤ 大卫·哈维、李媛媛、丁为民（2014）：“对《21 世纪的资本》的再思考——评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的资本》”，《国外理论动态》，第 9 期。



主流经济学认为不平等是良性的，它可以归结为不同水平的边际生产率和不同的教育与技能。那些高收入者被推定为在人力资本上有更大投资，并具有较低的休闲偏好，而穷人则相反。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适当的公共政策可以帮助减少不平等，但实际上这也可能使经济增长的能力受到损害，因此弄巧成拙。皮凯蒂不仅指出库兹涅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日益平等的假设是错误的，同时证明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人力资本平等的说法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同样是错误的。虽然皮凯蒂给了新古典经济学致命一击，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会生产出财富和收入（资本和劳动之间）间的分歧，也看不到全球南北差距，更不承认帝国主义的现实仍是全球垄断（跨国公司）统治。^①何帆认为，皮凯蒂的预言只是一个狂野的猜想。皮凯蒂认为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在长期内是没有关系的，资本的收益率在长期内是稳定的，而且一定会比经济增长率高，这都值得商榷。此外，皮凯蒂试图从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平等，但是他研究的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对发展中国家很少涉及，甚至对其他发达国家，比如南欧国家、日本都很少提及，这样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不全面的。如果把发展中国家考虑进来，一方面会影响到对全球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判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有其独特之处，和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并不完全一样。^②何帆指出，这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争议，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思潮出现巨大转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不平等将是21世纪经济学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③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证明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深，为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提供了理论上的佐证。

最近这次经济危机余波不断，金融化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改变着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使经济面临债务型通货紧缩及长期萧条的风险，这也使一些学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导致“间歇性停滞”，使得资本主义面临“停滞—金融化陷阱”，进而引发经济危机，有些学者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同时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只有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助于抓住危机的根源”，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具有参考价值。但是，某些西方学者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没有认清危机的实质，不从制度上反而从抽象人性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导致“危机背后的价值根源在于个人主义”的结论。对这类观点，我们应当辩证地分析与批判。

① Foster, J. B. & Yates, M. D. (2014). Piketty and the Crisis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onthly Review*, 66 (6).

② 何帆 (2014): “21世纪会更不平等么? ——评皮凯蒂新著《21世纪的资本》”,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5月18日。

③ 金辉 (2014): “《21世纪资本论》观点引发论争”, 《经济参考报》, 6月11日。

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新兴经济体在崛起,社会主义中国蒸蒸日上,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即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世界的动荡正是各种矛盾深化的表现。当然,从实际状况来看,美国的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力量还相当强大,主导着经济全球化,还不可能一时走向灭亡。对它们的实力,我们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过程的复杂性和事物的本质被掩盖,可以推迟死亡,但不能逃避死亡。”美国已经从金融帝国的金字塔顶尖上开始下滑,世界货币逐渐出现多样化趋势,就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的明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会改变。国内阶级分析与跨国阶级分析相互补充,从一国到多国,从局部到世界,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一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希望,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客观观察与描述的问题,还涉及评价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因此,西方学者评价“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既有从全球治理、发展模式、国家软实力建设视角等客观层面对其进行肯定的一面,也有从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维护现存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观层面进行不实批评乃至妄加指责的成分。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发展道路与中国模式是“资本主义的非自然增长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式的自然增长的发展模式”竞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质上中国与西方的竞争本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和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对我们而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初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综合平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处理好中国道路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环保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是我们今后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现实世界,包括国际不平等和国际金融危机等热点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探讨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研究范围比较宽广,方法更加多样,结论更为多元,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但是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论、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他们无一例外推崇马克思主义,但有些学者强调反思和重塑马克思主义,有些学者又停留在复述经典理论阶段,有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之嫌。一些学者批判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又没能完全摆脱其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又过于注重性质判断,对定量分析研究不够,某些结论稍显牵强;左翼学者大多赞成社会主义,但有一些理论构想具有空想成分,部分人主张改造和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想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我们应当全面地、理性地看待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尤其对西方左翼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要加以辩证分析,认识到其创新性和局限性。

(编辑:孙丽丽)